

政策规划

干部信誉、集体共识与乡村建设行动中的 新型社会资本参与

王建洪, 兰 欣

(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10)

摘要: 乡村建设行动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充分发挥村干部的组织聚合作用,有效引导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参与至关重要。基于 19 个省份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 Logit 模型,分析村干部在促进新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行动意愿提升中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村干部通过其自身信誉塑造与集体共识形成中组织聚合作用的发挥,显著促进新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行动的意愿。就效果而言,村干部作用对新型社会资本基于其切身利益关系紧密项目的参与意愿,以及对欠发达地区新型社会资本主体的参与意愿,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 乡村建设行动; 干部信誉; 集体共识; 新型社会资本; Logit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5)03-0225-07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来补齐农村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两大领域面临的突出短板,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举措。从理论上讲,乡村建设行动的政策目标在于有效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匮乏^[1],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藉此,在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领域社会资本参与严重不足,且地区差异十分明显^[2]的情形下,以加强政府投入的基础保障作用、提升政府投入效率^[3]为前提,充分发挥村干部的“主心骨”作用来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参与^[4],已成为中央及各级政府部门推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基本政策。从国家长期乡村治理的经验看,村干部“主心骨”作用在对政府引导以村民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微观行动中已得到充分体现^[5]。然而,近年来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其快速成长和发展不仅导致了农村传统社会资本结构的巨大改变,同时也导致了传统政府引导政策下村干部作用是否仍为有效的质疑。据此,本文从干部信誉、集体共识与新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的关系角度,对村干部是否仍能在政府引导机制下发挥作用进行实证检验。

1 文献综述

从现有相关文献看,学者们围绕村干部作用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乡村治理和干部信誉两方面。在乡村治理方面,普遍的观点认为,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十分关键。梅继霞和向丽明^[6]认为,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可具体体现为基石、引领、示范、协调和落实 5 方面。并且村干部在与政府、村庄互动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在多元利益主体的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并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7]。此外,村干部的行为逻辑亦会受到正式权力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俘获,导致村干部行为出现自利性特性,从而对乡村治理产生消极影响^[8]。对此,李增元和李芝兰^[9]提出,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村干部必须在正确乡村治理理念的加持下强化自身基层治理行为约束。在干部信誉方面,现有研究侧重于村干部面向农民所应当具有的信任水平(尤其是政治信任)展开研究。裴志军^[10]认为,在中国农村,农民的政治信任主要源自对村干部和乡镇基层政府的信心。一般意义上看,干部信誉对引导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总体上具有正向影响。干部信誉高意味着政府或干部行为会得到民众的广泛支

收稿日期: 2024-08-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GL213)

作者简介: 王建洪(1971—),男,四川绵阳人,经济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兰欣(1999—),女,四川雅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

持,从而推动各类参与行为的发生^[11]。同时,基于乡村“熟人社会”的客观现实,对村干部的高信任亦可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引导后者主动参与村庄事务^[12]。

乡村建设行动本质上是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而这种集体行动需要以集体共识的形成作为前提;然而,现有关于集体共识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鲜有对村干部与集体共识的关系进行考察。根据“信任-合作”理论,从信任的心理感知层面到合作的行动层面的落实过程,集体共识的形成必不可少;当民众对政府或干部的信任水平高时,交易成本得以下降,从而使合作趋于稳定^[13]。因此,Fu等^[14]认为集体共识形成的核心是基于合意客观和主观信任的意见互动。部分学者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增强群体感知可以促进集体共识的达成^[15],从而揭示了后者对公共事务的潜在影响。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干部行为与乡村治理、干部信誉,以及引导村民对公共事务参与的关系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总体上,现有研究对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塑造自己的干部信誉关注不足,也较少考虑到村干部的主动作为。并且以新型社会资本为对象进行村干部作用的研究十分缺乏。因此,基于村干部在乡村建设行动的“主心骨”和“领头羊”地位,本文创新性地从新型社会资本角度研究政府引导(村干部)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干部信誉与集体共识对新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意愿的影响

政府在农村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引导角色,通过政策推动、资金激励、补贴机制^[16]及提供资源,为农村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背景下,村干部作为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桥梁,在具体工作中起到纽带效应及桥梁功能^[17],能够有效地将政府政策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方案,推动村庄的发展及建设。干部信誉是村干部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础,村干部可通过公正、透明、勤勉的工作表现,来塑造自己的干部信誉;同时,还可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座谈会等方式,积极收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进而促使集体共识的形成。可见,在政府引导机制下,村干部通过自身信誉的塑造和在集体共识形成中发挥的组织聚合作用,可为提升新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行动的意愿创造有利条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在政府引导机制下,农村村干部可通过自身信誉塑造和在集体共识形成中发挥的组织聚合作用,促进新型社会资本参与意愿的提升。

2.2 干部信誉与集体共识对新型社会资本参与项目的影

村干部在带动村民发展农村产业中的作用十分明显,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也较高,其关键原因在于村民能从中明显受益^[18]。事实上,作为更为“精致”和理性的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新型社会资本,更加关注干部带动下的行动效益。对于乡村建设行动涉及的公共项目,从新型社会资本角度看,考虑其在参与不同类型项目中的受益程度不同,且存在明显“搭便车”机会的情形下,作为“精致”的理性决策者,与其切实利益关系紧密的项目必然成为其优先选择。因而,以利益(福利)为纽带,村干部通过积极作为可有效带动村民对村公共事务的参与^[19],这样的作用方式和效果同样可以体现在新型社会资本的引导过程中。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在政府引导机制下,农村村干部通过自身信誉塑造和在集体共识形成中发挥的组织聚合作用,可促进新型社会资本参与对其切身利益关系紧密项目的参与意愿。

2.3 干部信誉与集体共识对不同新型社会资本参与意愿的影响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村庄社会结构的不同,不同地区的乡村治理在结果上必然存在差异^[20],这些差异也一定程度反映了村干部作用发挥的程度。对于欠发达农村地区而言,新型社会资本数量较少、规模较小,本村成员占绝大部分,由此决定这部分新型社会资本更趋近于传统村民类社会资本;他们的关系网络根植于本村,并体现出对本村及村干部更强的依赖性,因而村干部积极作为发挥的效果可能较为明显。相反,对于发达农村地区而言,新型社会资本群体普遍较为年轻,文化程度较高,生产经营活动的空间更大,机会更多;此类特征的新型社会资本多为外来人员,常年“候鸟式”的生活方式,使得其与村干部的信任基础较为薄弱,与村干部之间的联系降低,通过沟通形成集体共识的难度较大。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在政府引导机制下,农村村干部可通过自身信誉塑造和在集体共识形成中发挥的组织聚合作用,对欠发达地区新型社会资本主体参与意愿,其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组实施的关于乡村建设行动中社会资本引导的随机问卷调查。本文引用的调查对象为新型社会资本主体,主要由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成。调查时间为2022年6月至2023年9月,调查地区分布于安徽、福建、甘肃、广东、广西、贵州、海南、吉林、重庆、四川、陕西、宁夏、河南、江西、湖南、河南、河北、青海、内蒙古19个省份。调查一共收回问卷386份,经过后期统计和整理,删除关键信息缺失等无效问卷10份,获得有效问卷376份,问卷有效率为97.4%。

3.2 变量选择

3.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新型社会资本对乡村建设行动的参与意愿。新型社会资本参与意愿共分为两类:一是基于有无回报的项目参与意愿,包括有偿参与意愿和无偿参与意愿;二是基于不同经济回报条件的项目参与意愿,包括社会资本对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发展,以及生活福利3类项目的参与意愿。

3.2.2 解释变量

干部的组织聚合作用,由干部信誉与集体共识表征,考虑研究目标在于探索村干部在政府引导新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行动过程中有效发挥作用的机理,因而将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设定为干部信誉(VC)与集体共识(CC)的交互项(即模型中的

VC×CC),农村村干部可通过自身信誉塑造和在集体共识形成中发挥的组织聚合作用,对新型社会资本的参与意愿产生影响。

3.2.3 控制变量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本文控制了影响新型社会资本主体对乡村建设参与行为的其他因素,主要包括新型社会资本的个体特征、经营特征(投资总额)、政策感知(政策认同)3个方面。其中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是否为本村户籍人员4个变量。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3.3 模型设计

乡村建设行动重点考察村干部在现行政府引导机制下的作用,而这些作用往往隐含于干部信誉塑造和集体共识形成过程,而后二者间往往存在内部的相互作用,故将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设定为干部信誉和集体共识的交互项。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社会资本是否愿意参与乡村建设分为“愿意”和“不愿意”两种情况,为了规避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估计的线性概率模型造成误差项分布的异质性问题,选用二元Logit模型^[21]:

$$Y_i = \beta_0 + \beta_1 VC \times CC + \beta_2 VC + \beta_3 CC + \gamma_i Z_i + \epsilon_i \quad (1)$$

式中: Y_i 为新型社会资本主体的参与意愿,其中 $Y_1 \sim Y_5$ 分别为新型社会资本有偿参与、无偿参与、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农村产业发展及参与生活福利项目的意愿;VC×CC为干部通过自身信誉塑造和集体共识形成,促进新型社会资本参与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设置及赋值说明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有偿参与意愿	否=0,是=1	1.00	0.00	0.86	0.35
	无偿参与意愿	否=0,是=1	1.00	0.00	0.83	0.37
	人居环境整治参与意愿	否=0,是=1	1.00	0.00	0.97	0.17
	产业发展项目参与意愿	否=0,是=1	1.00	0.00	0.94	0.23
	生活福利性项目参与意愿	否=0,是=1	1.00	0.00	0.95	0.22
解释变量	干部作用		1.00	0.00	2.91	0.22
	干部信誉	不信任=1,不确定=2,一般=3,信任=4,非常信任=5	5.00	1.00	3.90	0.77
	集体共识	受访者实际选择	1.00	0.00	0.73	0.22
控制变量	性别	女=0,男=1	1.00	0.00	0.84	0.36
	年龄	18~30岁=1,31~40岁=2,41~50岁=3,51岁及以上=4	4.00	1.00	2.90	0.82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专科=4,本科及以上=5	5.00	1.00	2.59	1.13
	本村户籍	否=0,是=1	1.00	0.00	0.86	0.34
	投资总额	100万元以下=1,100万~300万元=2,300万~500万元=3,500万~700万元=4,700万元以上=5	5.00	1.00	1.87	1.32
	政策认同	否=0,是=1	1.00	0.00	0.72	0.45

意愿所发挥的组织聚合作用,即后文中的干部作用; Z_i 为控制变量; β_0 为常数项; ε_i 为随机误差项; $\beta_1 \sim \beta_3$ 、 γ_i 为回归系数。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 1 可知,新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行动的平均意愿达到 91%,这在计量上难以准确反映解释变量对其的影响,故具体检验模型设计以新型社会资本的分类参与意愿为依据。本文根据 2 类参与意愿设计了 5 个模型,其中模型(1)和模型(2)按经济回报标准进行设计,分别考察有偿形式和无偿形式参与乡村建设行动的意愿选择情形;模型(3)、模型(4)和模型(5)则按新型社会资本参与项目标准进行设计,分别考察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农村产业发展项目,以及农村生活福利性项目的意愿选择情形。模型设定后,运用 Stata17.0 软件进行实证检验,得到 5 个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2。

4.1.1 对不同经济回报条件下新型社会资本参与意愿的影响

模型(1)和模型(2)分别反映了有偿和无偿条件下新型社会资本参与意愿的情形。模型(1)显

示,干部作用的回归系数值为 1.902,在 10%水平下显著为正;模型(2)显示,干部作用的回归系数值为 2.283,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无论在有偿条件还是无偿条件下,通过干部信誉塑造和集体共识形成中的努力,干部组织聚合作用的发挥均能够显著促进新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行动的意愿。相反,在不考虑干部作用发挥的情形下,政府对新型社会资本的引导机制难以在乡村建设行动中实现,干部信誉与集体共识的独立作用便失去目标指引,以及作用合力,最终在检验结果上表现为普遍性的不显著,以及方向偏差。假设 H1 得到验证。

4.1.2 对新型社会资本主体参与不同项目意愿的影响

对于与切身利益关系紧密的项目,诸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农村产业发展相关项目以及农村医疗卫生及养老等生活福利性项目,干部作用的回归系数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通过干部信誉塑造和集体共识形成中的努力,干部的组织聚合作用能够显著促进新型社会资本对于切身利益紧密相关项目的参与意愿。因此,假设 H2 得到验证。

表 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y_1	y_2	y_3	y_4	y_5
干部作用	1.902* (1.080)	2.283** (1.154)	2.470** (1.229)	2.706** (1.342)	2.163** (1.039)
干部信誉	-0.995 (0.737)	-1.661** (0.799)	-1.361 (1.625)	-1.895 (1.249)	-0.631 (1.077)
集体共识	-7.540* (4.029)	-8.835** (4.359)	-8.145 (9.080)	-8.949 (7.053)	-6.348 (5.733)
性别	0.529 (0.492)	-0.330 (0.512)	-0.668 (1.130)	-1.616 (1.164)	0.932 (0.765)
年龄	-0.203* (0.112)	0.323 (0.248)	0.964* (0.552)	-0.355 (0.415)	0.160 (0.431)
文化程度	-0.006 (0.193)	0.254 (0.178)	0.286 (0.399)	-0.401 (0.293)	0.205 (0.319)
户籍人员	0.147 (0.572)	0.0612 (0.506)	1.353 (0.940)	1.288* (0.725)	1.093** (0.557)
投资总额	0.273 (0.284)	-0.654*** (0.190)	-0.680 (0.486)	-0.783** (0.335)	-0.480 (0.337)
政策认同	1.407*** (0.363)	0.953** (0.382)	2.157** (0.920)	1.507** (0.623)	-0.578 (0.774)
常数项	1.634 (3.012)	3.437 (3.264)	-2.662 (7.049)	6.169 (5.427)	-0.466 (4.342)
Log likelihood	-115.234	-124.451	-32.251	-56.567	-53.095
LR chi2	68.04	81.20	27.23	31.40	32.30
Pseudo R ²	0.227 9	0.246 0	0.295 1	0.217 3	0.233 3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通过 1%、5%、10% 的显著性检验。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采用两种方法进行检验:一是更换回归模型,用 Probit 模型替换 Logit 模型^[22];二是替换被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采取不同定义划分形成新的变量进行拟合。新型社会资本主体的任一参与行为均赋值为 1,既不选择有偿参与也不选择无偿参与行为的赋值为 0,由此形成新的被解释变量-新型社会资本主体的参与程度,再次检验干部信誉、集体共识对新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的影响。两种检验方法结果见表 3,两类模型估计结果中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一致程度较高,均显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干部作用)对新型社会资本主体的参与行为有显著性影响,这表明 Logit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4.3 空间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根据空间分布划分样本,进行空间异质性分析,检验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知,干部作用对东西部地区的新型社会资本参与意愿的影响系数呈现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部地区的新型社会资本参与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新型社会资本少而小,各村庄新型社会资本数量较少、规模较小;同时这些主体也会发展成为乡村精英^[23],既是本村村民也是新型社会资本主体,其中以年长、文化水平较低的村民为主,对村干部的依赖性相对较强,与村干部的关系和交流较为密切,因此在西部地区,村干部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在东部发达地区,新型社会资本数量较多、来源较广,但调查对象仍以相对弱质的新型社会资本主体为主,这部分新型社会资本主体对于村干部作用较为敏感。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方法 1					方法 2
	(6)	(7)	(8)	(9)	(10)	y
	y ₁	y ₂	y ₃	y ₄	y ₅	
干部作用	1.430* (0.616)	1.923*** (0.710)	1.357* (0.754)	1.221* (0.687)	0.901** (0.429)	5.192** (2.498)
干部信誉	-0.806* (0.429)	-1.391*** (0.505)	-0.758 (0.812)	-0.867 (0.623)	-0.258 (0.527)	-3.422** (1.730)
集体共识	-5.738** (2.335)	-7.533*** (2.735)	-4.507 (4.545)	-3.933 (3.432)	-2.603 (2.866)	-19.620** (9.93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905 (1.767)	4.017* (2.052)	-0.910 (3.527)	3.017 (2.705)	-0.199 (2.159)	7.294 (7.481)
Log likelihood	-114.247	-123.222	-32.121	-56.274	-53.956	-40.338
LR chi2	70.02	83.66	28.03	31.99	30.58	38.93
Pseudo R ²	0.2346	0.2534	0.3038	0.2213	0.2208	0.325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通过 1%、5%、10% 的显著性检验。

表 4 空间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有偿	无偿	有偿	无偿	有偿	无偿
干部作用	3.107* (1.714)	4.517** (2.008)	-6.087 (4.479)	4.404 (4.130)	3.452** (1.588)	3.009* (1.621)
干部信誉	-1.609 (1.113)	-3.172** (1.499)	5.626 (3.535)	-2.860 (3.086)	-1.851 (1.175)	-1.65 (1.164)
集体共识	-10.961* (6.099)	-19.536** (7.969)	20.981 (16.638)	-18.158 (16.477)	-13.023** (6.206)	-9.762 (6.3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7.187* (3.931)	14.578** (5.963)	-16.273 (11.938)	12.748 (12.178)	8.425* (4.586)	7.017 (4.511)
样本数	57	57	51	51	268	268
Log likelihood	-22.775	-26.499	-9.444	-28.966	-104.616	-90.072
LR chi2	4.17	12.7	3.93	2.01	13.13	11.86
Pseudo R ²	0.0839	0.1934	0.1723	0.0336	0.0591	0.0617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通过 5%、10% 的显著性检验。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基于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行动的现行机制,分析了村干部在促进新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行动意愿提升中的作用机理,并基于19个省份的新型社会资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对上述机理进行了验证。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基于乡村建设行动的政府引导机制,只有在干部信誉与集体共识交互作用下,才能充分体现村干部的能动性,并显著促进新型社会资本对乡村建设行动的参与意愿。

(2)在政府引导机制下,村干部通过自身信誉塑造和在集体共识形成中发挥的组织聚合作用,对新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行动意愿提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于对新型社会资本切身利益关系紧密的项目。

(3)在政府引导机制下,村干部通过自身信誉塑造和在集体共识形成中发挥的组织聚合作用,对欠发达地区新型社会资本主体参与意愿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5.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以提升新型社会资本对乡村建设行动的参与意愿为目标,从机制优化角度提出3方面的政策建议。

(1)在后续乡村建设行动中,要在强化村干部发挥“主心骨”和“领头羊”作用的同时,基于村干部自身信誉塑造和集体共识形成的组织聚合功能,优化村干部科学发挥作用的机制。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干部信誉的双重标准,即政府赋予的政治信誉,以及包括新型社会资本在内的全体村域社会资本对其产生的信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乡村自治中以村干部为纽带的民主决策制度,使村干部的组织聚合作用在民主决策机制下促成真正的集体共识。

(2)在后续乡村建设行动中,要在进一步强化村社区自治功能的基础上,优化村干部的选拔、培养和培训机制。首先,考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当前农村社会资本主体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村干部的选拔应当考虑本文所论新型社会资本主体的平等参与权;其次,村干部的培养要下沉到村社区,建立村域发展贡献和包括新型社会资本在内的村民满意评价作为培养标准;最后,要对村干部开展针对乡村建设行动,以及新型社会资本引导与组织工作的专业化培训,提高村干部的实际工作

技能。

(3)在后续乡村建设行动中,政府需要在进一步强化乡村建设投入的同时,强化对新型社会资本村域公共产品需求的响应机制。一方面要赋予新型社会资本对乡村建设项目决策、监督、评价等程序的平等参与权,使政府投资与新型社会资本的需求相适应;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强化村干部在政府投资与新型社会资本参与之间的沟通、组织与协调工作,以畅通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信息渠道,理顺新型社会资本的参与机制。

参考文献

- [1] 王丹利, 陆铭. 农村公共品提供: 社会与政府的互补机制[J]. 经济研究, 2020, 55(9): 155-173.
- [2] 罗煜, 王芳, 陈熙. 制度质量和国际金融机构如何影响PPP项目的成效: 基于“一带一路”46国经验数据的研究[J]. 金融研究, 2017(4): 61-77.
- [3] 黄少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发展战略的阶段性演变及其理论总结[J]. 经济研究, 2018, 53(12): 4-19.
- [4] 祁志伟. 社会资本何以驱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创新: 对民族地区T牧区的考察[J]. 图书馆论坛, 2021, 41(3): 87-101.
- [5] 刘合光. 激活参与主体积极性,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1): 14-20.
- [6] 梅继霞, 向丽明. 村干部公共领导力如何影响乡村治理绩效: 一个链式中介模型[J]. 管理学报, 2023, 36(4): 75-91.
- [7] 梁振华, 李倩, 齐顾波. 农村发展项目中的村干部能动行为分析: 基于宁夏张村的个案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30(1): 66-73.
- [8] 蒋永甫, 杨祖德, 韦赞. 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的行为逻辑与角色规范[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115-122.
- [9] 李增元, 李芝兰.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治理重心向农村基层下移及其发展思路[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11): 82-93.
- [10] 裴志军. 自我效能感、政治信任与村民选举参与: 一个自治参与的心理机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4(7): 49-58.
- [11] PRAZAN J, THEESFELD I. The role of agri-environmental contracts in saving biodiversity in the post-socialist Czech Republic[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ommons, 2014, 8: 1-25.
- [12] 朱凯宁, 高清, 靳乐山. 收入水平、村干部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分析: 基于云南省465个农户调研数据[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1, 30(10): 2512-2520.
- [13] LEWIS P A. Trust: forms, foundations, functions, failures and figures[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4, 114: 156-158.

- [14] FU Y Y, LIANG D C, XU Z. Higher-order interaction of stability simplicial complex driven group consensus reaching in social network [J]. *Information Fusion*, 2024, 103: 102095.
- [15] LI T Y, PARKER JEFFREY R, CLARKSON JOSHUA J. Degree of group consensus shapes perceived power structures and decision-process evaluations of groups[J].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023, 26(8): 1931-1950.
- [16] 肖唐鏢, 赵宏月. 政治信任的品质对象究竟是什么? 我国民众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19(2): 61-72, 127.
- [17] 王杰. 村干部职责超载现象探析[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 15-18, 23.
- [18] 韩旭东, 李德阳, 郑风田. 政府、市场、农民“三位一体”乡村振兴机制探究: 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剖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3): 52-61.
- [19] 苏红竞. 苏北农村公共事务中的村民行为选择与行政因素探究[D]. 南京: 南京理工大学, 2010.
- [20] 吕书鹏, 朱正威. 政府信任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对 China Survey 2008 数据的双层线性回归分析[J]. *公共行政评论*, 2015, 8(2): 125-145, 182.
- [21] 王俊龙, 郭贯成, 谈林沂. 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苏州、宿迁 1292 份农户调研数据[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3, 22(1): 123-132.
- [22] 杨秀丽, 马丽娜. “双碳”目标下基层组织嵌入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的影响: 基于村庄归属感的中介效应[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23, 39(10): 1247-1256.
- [23] 朱战辉.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精英再造与治理机制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6): 126-136.

Cadre Credibility, Collective Consensus and New Social Capital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Construction Actions

WANG Jianhong, LAN X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rategy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crucial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organizational aggregation role of village cadres and effectively guide the participation of new social capitals formed mainly by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ubject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from 19 provinces, the mechanism of village cadres in promoting the willingness of new social capital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construction actions was analyzed by using a binary Logi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village cadr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willingness of new social capital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aggregation in shaping their own credibility and collective consensus formation. In terms of effect, the role of village cadr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new social capital to participate in project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as well as on the willingness of new social capital subjects in less-developed areas.

Keywords: village building initiatives; cadre credibility; collective consensus; new social capital; Logit model